

第1章

導論

1.1 問題提出

西方對男性氣質的研究開始於1930、1940年代，真正具有社會學理論意義的男性氣質研究則始於1980年代，如今已經成為社會性別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之一。

男性氣質，相對應的英文詞是Masculinities，漢語中有不同的譯法。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譯法為「男性氣質」（康奈爾，2003）；在臺灣，曾有學者使用「陽剛之氣」這一譯法（高穎超，2006），但以「陽剛」定義男性氣質，違背了我們要論述的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特徵；此外還有「男性特質」的譯法（譚兢嫦、信春鷹，1995: 199），但「特質」具有「獨特」、「特定」的涵義，有普遍化、本質化的傾向，也違背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實踐性。還有學者譯為「男性氣概」（肯尼斯·克拉特鮑，2003）。筆者自己也曾長期主張應該譯為「男性氣概」，認為如果譯為「男性氣質」容易與心理學的「氣質」相混淆，而且漢語中素有「男子漢氣概」的說法，易於被漢語的使用者所理解（方剛，2008: 3）。問題是，當我們使用「男性氣概」的時候，似乎仍然在強調「男子漢」這樣一種性別模式，強調「陽剛」，同樣有違我們要講的性別氣質的多樣性，最終我還是決定使用男性氣質這一譯法。畢竟，相對應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這一譯法已經廣為學術界接受，更容易放在一起比較談論而不會產生誤

讀。

本研究使用Masculinities的複數形式，是因為筆者認為男性氣質是多樣的，不同文化、種族、階層男性的Masculinities是不同的，雖然早期的男性氣質理論並不認同這一點。

按性角色理論的看法，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是男性的性別特質或特徵，是男性所具有的普遍的、本質的性別屬性；但是支配性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這一概念提出後，有關男性氣質多樣性的理論則認為男性氣質只是男性在性別關係中的實踐，是一種多樣的、無法進行狹隘定義的性別實踐的過程。男性氣質研究專家康奈爾指出：「如果『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能夠簡明定義的話，那麼它既是在性別關係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過實踐以確定這種位置的實踐活動，以及這些實踐活動在身體的經驗、個性和文化中產生的影響」（康奈爾，2003: 97）。

康奈爾的男性氣質四分法研究影響深廣，然而這個研究模式具有結構主義的傾向，使得男性氣質研究基本上仍屬於一種靜態的研究。此外，西方學者較多強調生命史不同階段男性氣質實踐的差異，而缺少對生命史同一階段不同情境、甚至同一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研究。也就是說，缺少一個縱橫交織的立體視角。這些本研究均提出了挑戰。

男性研究是在女性研究的推動下活躍起來的，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理論可以說是多樣性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基石（方剛，2005: 3-4）。目前西方的男性氣質研究已經影響到社會學幾乎所有的分支學科，但中國社會學界對男性氣質的研究仍然處於空白狀態。本研究希望可以填補這一空白，為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開啟新的空間。

本研究主要探討：多樣的男性氣質在實踐中是如何建構的，不同情境與符號中的男性氣質建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因

素如何發揮作用，它們彼此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為了探討這一理論問題，本研究選擇男性性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在關於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論述中，甚至在一般民眾的觀念中，男性一直被認為在性關係中是主動的、支配的、購買性服務的。而出售性服務給女性的男性性工作者，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或在表面上看來，在和女客人的性關係中是被動的、被支配的、被購買的。男性角色的這種顛倒，對傳統的男性氣質概念提出了顛覆，顯示了男性氣質的多樣性。對此，後文還將詳細闡述。對這種挑戰與顛覆的研究，可以成為我們分析男性氣質建構的一個關鍵點。因此，本研究屬於基於目的性抽樣基礎上的質性研究，希望通過對男性性工作者在生命史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氣質實踐的考察，來回答關於男性氣質的理論問題。

本研究實際上在對「性／別」的研究。中文語彙中，「性」(sex)與「性別」(gender)有著不同的含義，前者強調性慾，而後者強調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似乎二者是可以徹底分割開討論的。在學術界也是一樣，當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研究「性」的學者極少涉及「性別」，而研究「性別」的學者也普遍迴避「性」。本研究，則將性與性別置於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視域中。「性／別」這一用法來自於臺灣的學者何春蕤，她曾這樣論述：「我們重視情慾的各種差異（性的『別』），性別中的情慾差異（性別中的『性』別），以及性與性別、階級、年齡、種族、身體等社會差異之間的關係。」（何春蕤，2001: i）

1.2 文獻綜述

如前所述，本研究是對於「性／別」的研究，將性（性工作）與性別（男性氣質）結合起來分析。所以，在梳理以往理論的時候，將男性氣質對性的研究也一併列入。而本研究採取目的

性抽樣的方法，選取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進行具體分析，可惜關於這一人群以往的學術研究非常稀少。

1.2.1 男性氣質的性角色理論

1920、1930年代，因為工業革命的發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男性氣質研究開始在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使家庭中的勞動力走向社會，男女的勞動分工差異加大，男人成為家庭的主要養護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男性的勇敢和強壯的身體也提出更高要求，正是這些促成了最早的男性氣質研究，即下面所討論的性角色理論的男性氣質研究。

性角色理論（Sex role theory）從193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一直是統治男性氣質研究領域的主流理論，它的核心就在於對男女不同角色的強調。

性角色理論主張，作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就意味著扮演人們對某一性別的一整套期望，即性角色。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兩種性角色：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性角色理論區分了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不同，與男性聯繫在一起的是技術熟練、進取心、主動、競爭力、抽象認知等等；而與女性氣質聯繫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親和力、被動等等。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很容易被解釋為內化的性角色，它們是社會習得或社會化的產物。這一理論強調社會塑造男性或女性，與他們的生理性別相結合（Brannon, 1976）。

有些學者研究天生的生理差別對兩性社會行為有不同的影響，認為男性氣質更為進取、競爭、好鬥、暴力，是由生理決定的。此種生物決定論習慣於將對低等動物的研究中發現的規律推論到人的身上，同時也非常容易導致種族主義，這些都受到了批評。事實上，並沒有證據顯示某種生理差別必然會導致某種社會行為；調查顯示，不同文化中的男性氣質是不同的，男人並不因

為都長有陰莖便有相同的男性氣質（Kimmel & Messner, 2004: xi-xii）。

Terman 和 Miles 提出，不同的性別有其心理標準，體現為不同的行為、態度、特性和興趣。但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符合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標準，因此也會有「女性氣質男人」（The effeminate man）和「男性氣質女人」（The masculine woman），對於偏離則應該進行矯正。他們提出了一個「男性氣質—女性氣質」（Masculinity-Femininity）的量表，以測量每個人處於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哪一個點上（Terman, Miles, 1936）。1930、1940 年代，各種測量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量表都被製造出來，其理論基礎並沒有大的變化，都集中在考察主體的氣質為何「不符合標準」。這些研究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定出了對立的兩個僵化標準，簡單地認為不符合標準的人是有心理問題、需要治療的，而本書的研究將揭示男性氣質具有多種多樣表現的正當性，沒有也不會有固定的標準，更是不可能通過「治療」來「統一」的。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量表研究的另一個局限是，它們完全忽視了社會文化的影響因素。20世紀中期，社會學中功能主義的 Parsons（帕森斯）批判了心理學研究男性氣質的方法，他發展出一個分析男性氣質的綜合框架，這個框架包括：社會學中的社會化過程、心理學對個人成長過程的精神分析、家庭中內在的形式互動、勞動力的性別分工（Parsons, 1964）。但是，Parsons 僅是在性角色理論的框架中加入了社會學的分析視角而沒有對性角色理論本身進行否定。1980年代，批評性角色理論的聲音更加強大，Pleck 認為性角色是有彈性和歷史特性的，不是僵死的。他認為性角色理論不能表現男人的經驗（Pleck, 1981）。

在筆者看來，性角色理論的根基來自於男女生理的差異。性角色被鑄造在一個僵死的容器裏，男人和女人被要求依據他們的生理性別進入這個容器，而不管他們在行為或態度上多麼不適合

這個容器。這種理論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因此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變化，也不能幫助我們理解個人如何針對性別期望的設定來調整他們的角色。性角色理論忽視了個人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定義與再生產，同時這個理論很少談男女間的權力，它的框架掩蓋了權力和物質的不平等。

在性領域裏，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性氣質為：

1. 不像女人。男人必須在任何表現上都遠離女人，不能像女人那樣重情感、被動。對男同性戀的恐懼也使男性需要建構這種男性氣質。
2. 追求成功。包括事業的成功，也包括性能力上的成功，這二者對男人同樣重要。
3. 擁有自信。在性上，男人應該強硬、自信、自我依賴，不對他們自己的性能力有任何懷疑。
4. 主動的性。在和女人的性關係中占據主動和上風，具有膽量、強力，有暴力傾向（Brannon, 1976）。

Ken Plummer認為，直到性角色理論被解構之前，男性氣質在性上的表現，一直被解讀為應該是充滿權力的、強烈的、受自然本能驅使的、難以控制的、陰莖中心的、只為了滿足生理機能的等等。男人與女人不同的性表現便是強姦、購買性服務、鼓勵性崇拜、性暴力。男人比女人更常是性的消費者，嫖娼亦是體現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對男性氣質的強調，突出了男人在性上強調陰莖中心的特點：陰莖對男人而言非常重要，男人用它來建構男性氣質（Plummer, 2005: 178-195）。

按著這個理論，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便完全無法被解釋，或者是需要加以「治療」的。比如他們出售而不是購買性服務，他們在和女客人的關係中是被消費者而不是消費者，是「被嫖」而非「嫖」，在性行為中並不堅持通過陰莖中心來建構男性氣質等等。男性性工作者在性產業從業中的諸多男性氣質實踐，說明了

性角色理論這個容器裝不下男性氣質，男性氣質具有多樣性。而本研究將分析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實踐出來的。

1.2.2 男性氣質的多樣性與性的多樣性

有學者認為，直到「支配性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 這一概念被提出，真正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男性氣質研究才開始出現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本文將Hegemonic Masculinity譯作支配性男性氣質，是採用康奈爾《男性氣質》中文簡體字版的譯法，也有學者譯作霸權主義男性氣質、「王道陽剛氣質」(高穎超，2006)等。

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是在1982年發表的一篇對澳大利亞高中的田野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的。Kessler等人在這項研究中揭示，影響男性氣質的因素可分為許多種層次，包括性傾向的、階級的、種族的等等，它們共同參與了男性氣質的建構。因此，男性氣質是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性角色理論所定義的單一的男性氣質，實際上是一種「支配性男性氣質」，而除了「支配性男性氣質」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男性氣質 (Kessler, Ashenden, Connell, & Dowsett, 1982)。

對支配性男性氣質這一概念的使用，意味著承認了男性氣質是有許多種的。此前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性氣質，實際上是依據歐美的、白種人的、中年的、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的男人來定義的；男性氣質研究應該給予工人階級的、有色人種的、同性戀的、年輕或年老男人間的差異足夠的重視。男性氣質不是單一的，而是需要檢驗的，不同的男人建構了不同的男性氣質。社會建構的機制與過程進入了男性氣質研究的視野。

在性與男性氣質的研究中，性不再被認為是只由生理性別決定，它不再是單純的生理問題。人類的性與歷史、文化、政治與道德、親密關係等等聯繫在一起，而且一直是開放的，處於變化

中的。性同樣與階級、性傾向、年齡、家庭結構、信仰、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社交群體等等都有關係。對性的理解，只能在一個人的具體關係中進行。

Plummer指出，強調男人的性的這種多樣化，並不是否定支配性男性氣質所定義的支配性的性的存在。它確實存在，而且非常常見，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關注支配性的性是對的，但同時不能忽視男人對這種支配性的性同樣可以進行抵制與轉換。男人的性是社會行動的產物，性是和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的，並不只是內在動力。支配性可提供一種理想模式，但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實踐中建構的。性不是男人的簡單財產，不存在於社會真空中，而是和社會一起流動，在人類的相互影響中建構的（Plummer, 2005）。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本研究將男性性工作者置於不同的情境中進行考察，以揭示其性領域的男性氣質實踐在具體關係中的主體建構過程。

支配性男性氣質理論關於性的這些定義，與中國學者潘綏銘等人稱之為「主體建構論」的性學理論是相一致的。按著這一學派對Sexuality（性）的理解：「Sexuality是主體感受的。無論生物學給出什麼樣的定義，彌散式的Sexuality只能存在於主體對它的具體感受之中，或者說，只有確實被某個人所感受到的那些東西才足以構成他（她）的Sexuality；Sexuality是被主體所標定的。它不僅僅是一種『可測定的客觀存在』（例如人們通常所關心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更是一種主體（人們自己）依據自己的感受、認知與自我回應，對於『性』（Sex）所做出的種種標定、解釋與評價，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日常生活實踐』，例如選擇、策略、路徑等等。Sexuality是一個持續可變的過程，它的變化更多來自於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Sexuality的意義來源於主體和情境（Context）的互構。Sexuality的意義既不來源於『天生的自然本能』，也不是『歷史決定』或者『環境決

定』的被動產物。它是主體能動性與這些『外來物』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黃盈盈、潘綏銘，2006）。

男性氣質理論與性研究的理論在這裏找到了交融點。男性氣質和性一樣，都是主體化的、被建構的、情境化的、可變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男性性工作者的職業實踐，使其至少在表面上與性角色理論關於男性氣質在性領域的表現是完全倒置的，即他們在與女客人的性關係中是從屬的、被支配的、被動的、被購買性服務的。這種與性角色理論定義的男人的性的鮮明對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分析物件，即男性氣質是如何在具體的情境中建構的。

1.2.3 康奈爾對男性氣質的分析

男性氣質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康奈爾（R.W. Connell）。康奈爾首先是一位女性主義學者，他的男性研究是基於女性主義的社會性別理論基礎上進行的研究。但是，康奈爾的理論仍然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本研究便是基於對康奈爾理論的借鑒和批評而提出自己的理論。

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單位

康奈爾認為，男性氣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實踐中建構出來的。「性別的常識性知識絕不是恆定的，而是在不斷變化的實踐中的理性認識，通過這些實踐，性別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或『完成了』」（康奈爾，2003: 7）。

康奈爾通過下述三個分析單位來考察男性氣質在其中實踐的機制：

1. 個人的生活經歷：康奈爾採取的方法是進行生命史研究，其中又特別加入了對身體實踐的研究。
2. 符號實踐：即話語、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的一面，這種符號

實踐活動可能比任何個人的生活都延續得長久；

3. 性別建構的場所：即國家、工作場所和學校等機構（康奈爾，2003: 99）。

筆者認為，以康奈爾的「場所」作為分析單位，過於龐大，失之於不夠具體。同一場所中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符號，因此主張對更為具體的「情境」進行分析。本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採納了康奈爾的上述三個分析單位，對資訊提供者（對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一種平等的稱謂）進行生命史的考察，同時將符號與場所的分析相結合，以具體的「情境」代替「場所」，提出不同情境中的不同符號下，會實踐出不同的男性氣質。

此外，康奈爾非常強調身體在男性氣質實踐中的作用，還提出了「集體維度」的概念。本研究後面的分析中也將有所涉及。

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建構的男性氣質

康奈爾認為，「男性氣質不是一個孤立的客體而是一個大結構的一部分」（康奈爾，2003: 91），男性氣質在這個大結構中實踐。

康奈爾提出，相互影響的社會層面構成了社會的性別秩序，即遍布全社會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之間的關係模式，這涉及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康奈爾不僅用三重關係分析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用它來分析女性氣質的建構。

權力關係指社會上「女性的整體從屬地位和男性的統治」（康奈爾，2003: 101）。安東尼·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權力是通過機構、國家、軍隊和家庭生活中的諸如權威、暴力和意識形態等社會關係起作用的」（安東尼·吉登斯，2003: 150）。

經濟關係更多指在兩種社會性別之間存在著一種勞動分工，而這種分工又是與謀取利益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通過性別的勞動分工，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可避免的是一個積累性別差異的過

程。結果就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控制著主要的公司和大筆的財產（康奈爾，2003: 101-102）。

情感關係指社會成員之間傾注的欲望、渴求與情感，吉登斯對康奈爾提出的情感關係的解釋是：「指私密、情感和個人生活中的動力學，包括婚姻、性行為和孩子養育」（安東尼·吉登斯，2003: 150），馬爾科姆·沃特斯也有進一步闡釋：「異性戀的正常結構模式是，婦女以一種不同於男人的方式，成為慾望的對象，就此具有了性別」（馬爾科姆·沃特斯，2000: 297）。

男性氣質是在上述三重關係下，在實踐中建構起來的。建構強調的是動態的狀態，是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決定作用。

吉登斯這樣評價康奈爾：「他的理論在社會學界特別有影響，因為他把父權制和男性氣質概念結合為一個性別關係的綜合理論。在康奈爾看來，男性氣質是性別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與性別秩序或者和與之相伴的女性氣質分開理解」（安東尼·吉登斯，2003: 149）。

作為一位社會性別理論家，康奈爾是在父權社會的體制中思考三重關係的。就整個社會而言，男性在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支配的地位，而女性則處於弱勢、服從的地位。康奈爾的這一論述無疑是切實的，但是，他並未分析具體情境與關係中私人間的三重關係。在具體的情境中，男女雙方私人間的優勢與弱勢、支配與服從關係，可能和整個社會層次上的關係是不一致的。

筆者在本研究中發現，在具體的人際交往中，特別是男性性工作者與女客人間在上述三重關係中的位置和整個社會層次上三重關係的位置是不同的，筆者稱之為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這種個人與社會整體的差異，正是分析男性氣質實踐能動性的一個關鍵點。

另外，三重關係彼此之間存在交叉之處，這也是我們在分析

的時候需要注意到的。本研究在具體分析過程中均將有所展開。

對不同男性氣質的描述

康奈爾將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邊緣性。這些均是男性氣質的不同表達方式，而這些方式間存在著等級，它們共同建構著現代西方性別秩序中主流男性氣質模式的種種實踐和關係。

支配性：支配性男性氣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一個集團可以憑藉支配性男性氣質來宣告和擁有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具有男性氣質就具有了權力，當文化的理想與組織機構的權力達成一致時，支配性才能建立起來。這種權力可能是個人性的，也可能是集體性的，商界、軍隊、政府高層提供了獲得這種權力的樣板。

從屬性：支配性與整個社會的主導文化有關，在這個總框架中，存在著不同男性群體之間的具體的統治與從屬的性別關係。男性中也有性別等級，同性戀就處於最底層，其處境類似於女性。一些異性戀男人也被從合法性的男性氣質圈中驅逐，處於從屬的地位，如貧窮者。

共謀性：能夠從各方面嚴格實踐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男性是相當少的，但大多數男人從支配性中得到好處，這是男人們普遍從女性的整體依附中獲得的。某些人一方面謀取權力的利益，一方面又避開父權制推行者所經歷的風險，在婚姻、父親職責以及社區生活等方面經常要與女人做出廣泛的妥協，而不是赤裸裸的統治或者說一不二，這類人就在實踐共謀性男性氣質。

邊緣性：邊緣性是性別與其他結構如階級和種族的相互作用，發展出的男性氣質之間的進一步關係。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與從屬階級或種族集團的邊緣性男性氣質之間存在關係，比如，黑人男子具有從屬性男性氣質，而富有的黑人明星則顯示邊

緣性男性氣質（康奈爾，2003: 104-111）。康奈爾曾說：「……支配性男性氣質和邊緣性男性氣質不是固定的性格類型，而是在變化的關係結構中特殊情形下產生的性別實踐的形構。任何有價值的男性氣質理論都必須對這種變化的過程給出說明」（康奈爾，2003: 111）。

對康奈爾男性氣質四分法的批評非常多。Martin指出，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導致了一系列不一致的運用，有時候這個概念指的是男性氣質的固定類型，有時候指的是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Martin, 1998）。Wetherell 和Edley也指出這個概念沒有特別點明在實際中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特徵（Wetherell & Edley, 1999）。

在筆者看來，康奈爾具有矛盾性。當康奈爾強調男性氣質是在實踐中建構的、男性氣質是多樣的這些觀點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後現代主義的一面；但是，當康奈爾將男性氣質分為支配性、從屬性、邊緣性、共謀性的時候，無論他自己怎樣強調這些均不是僵死的類型，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其結構主義的特徵。

康奈爾描述的四種男性氣質的關係中，支配性與從屬性是男性氣質的兩極，邊緣性與共謀性則是處於兩極的中間位置。如果我們把康奈爾的四分法理解為一種絕對的分類，那麼它顯然無法窮盡男性氣質的所有可能。如果我們確實承認男性氣質是一種實踐，那麼，它就註定是更多樣的，有多少種實踐的可能，就有多少種男性氣質，是無法事先分類的。但在筆者的理解中，康奈爾的四分法更準確地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理想類型，或者是發展趨勢，這樣就對我們很有啟發性了，而且也給我們提供了擴展的空間。在此項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中，筆者便清楚地認識到，無法簡單地將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歸入任何一種類型，甚至無法將某一情境下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歸入任何一種類型。因此，筆者試圖發展出自己對多樣男性氣質的描述。

筆者認為，康奈爾對支配性與從屬性的提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男性氣質的理想類型，它們分別處於男性氣質的兩端。但是，與其將支配與從屬視作男性氣質的兩種類型，不如將其視作男性氣質的兩種趨勢。趨勢不同於類型之處在於，它提供的是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不是一種可以歸於其中的靜態的分類。某一男性氣質的實踐可能在某一時刻受到某種趨勢的影響較多，比如我們可以說某人在實踐中表現出了較多的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卻不可以說它是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因為個人的男性氣質往往在不同場域以及與不同人互動時有著不同的實踐，所以只能是趨勢而非類型。

當我們從一種男性氣質的具體實踐中看到如下特點，我們便可以說它體現出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主動的、競爭的、擁有權力的、控制的、主宰的等等；相對而言，男性氣質的從屬趨勢則具有如下的特點：被動的、服從的、沒有權力的、可以被控制和被決定的等等。更多的時候，具體的男性氣質實踐是在支配趨勢與從屬趨勢之間建構的，是一個流動的過程。筆者將支配與從屬難分伯仲的中間狀態，稱之為關係均衡趨勢。

但筆者並不滿足於這一組三種趨勢的提出，因此又結合對中國本土男性氣質研究的分析，提出了男性氣質的剛性趨勢、柔性趨勢、剛柔相濟趨勢。對此，後面將具體論及。

1.2.4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互動、內在支配性及地理差異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男性氣質理論繼續在批評與爭議中發展，其主流可以稱之為男性氣質的社會建構理論。Michael S. Kimmel和Michael A. Messner總結了這一理論，認為其中三個重要的部分便是：社會建構觀、多樣觀和生命史觀（Kimmel & Messner, 2004: xv-xvii）。

男性氣質研究已經普遍拋棄了性角色理論的視角，而認同於

男性氣質的多樣性，但非常多的研究仍然把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對立起來，男性氣質研究總是傾向於人為地預設兩性間各自分離的空間，不把女性看作分析的相關因素，僅僅是通過對男性和男性之間關係的考察來分析男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846-848）。

筆者認為，社會性別總是相關的，男性氣質是在與女性氣質的相互關係中確定的。女性在男性氣質的實踐過程中常常具有重要作用——作為母親、同學、女朋友、性夥伴、妻子、女性勞動力等等。所以，在本項研究中，筆者一直將女性氣質對男性氣質的影響列入分析視野，考察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之間的互動。

Demetriou在批評康奈爾男性氣質四種類型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男性氣質二分法。他將支配性男性氣質做二種劃分，有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與內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兩種支配。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優越於女性的社會制度，內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優越於其他男性的社會優勢。Demetriou認為，這兩種支配性在以前的理論中是不清楚的，也沒有明確說明。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氣質整體的支配性，而內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菁英階層的男性氣質（Demetriou, 2001）。

在筆者看來，即使在同一職業的男性當中，也存在著等級的差別，而這種差別使得他們在相同情境中實踐出來的男性氣質也是有差異的。本研究中，筆者便分析了「高等級」的男性性工作者對其他男性性工作者的「內在支配」，以及這對他們男性氣質實踐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普及，跨國界舞臺對男性氣質的重要性不斷被論及。因此，地理差異對男性氣質實踐的分析近年來也受到重視，男性氣質研究的不同地理層次被提了出來：

1. 地方層次：在面對面互動情景中建構的男性氣質，如家庭、工作場所以及最親近的社區。

2. 地區層次：在文化和國家層次上建構的男性氣質。

3. 全球層次：具有跨地區的、全球性特點的男性氣質，可以通過國際商業和傳媒相互影響的（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849-850）。

全球化對非西方國家男性氣質的影響更受到注意。西方的男性氣質，通過殖民經濟、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勞力輸出、跨國際媒體等等，對非西方國家施加深刻影響。在地區層次上看，經濟重建的過程、遠距離移民、發展議題引起的變動對男性氣質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影響（Connell, 2005; Morrell & Swart, 2005）。加入全球經濟與全球文化，必然改變本國的性別現狀，也導致重構男性氣質。在這一過程中，不單是男性氣質被重構，女性氣質也同樣被重構（Connell, 2005: 71-89）。

但在筆者看來，假設一個從全球到地區、再到地方的關於權力與權威的簡單等級容易產生誤導，使得全球性的決定力常被高估，而對它的抵制，以及我們可以稱之為地區層次對男性氣質建構的影響力，很容易被忽視。而且一些有限的對男性氣質的全球層次的研究，也沒有顯示出它具有超越地區層次和地方層次男性氣質的能力（Connell, 2005; Hooper, 2001）。

因此，本研究將充分考慮「全球層次」、「地區層次」與「地方層次」三者間的關係，立足於中國本土，考察男性氣質的建構過程。全球層次的男性氣質對地區與地方層次肯定存在著影響，但哪一種影響更大，而且這影響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均是需要考察的。

1.2.5 中國的男性氣質研究與「剛／柔趨勢」

中國大陸已有的男性氣質研究文獻主要是哲學界和文學界的研究。它們的特點是，沒有與當代西方男性氣質理論相結合，主

要集中於對中國文化中男性氣質表現的分析，以及這種男性氣質的文化與哲學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研究不具備社會學意義，更無法與「支配性男性氣質」概念提出後的西方男性氣質理論進行對話。但是，其中對中國男性氣質「柔化」的分析，對於本項研究具有啟發性，筆者視之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男性氣質的實踐。

楊雨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結構導致了兩性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明顯地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化「溫柔敦厚」氣質的形成上（楊雨，2004）。對於這種「獨特的社會文化與社會心理結構」，李修建曾針對魏晉時代主流的男性氣質加以論述。他認為，魏晉士人身處亂世，社會混濁不堪，在某種程度上使其氣質偏向陰柔的一面。老莊的隱逸思想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並衍生出魏晉玄學，而魏晉玄學又使得魏晉人士格外關注個體自我，特別是身體形象。那個時代崇尚「清」的審美觀，推崇「膚清」、「神清」，表徵為瘦、白。士人的榜樣作用，最終促成了中國社會乃至文化中的「柔」的男性氣質（李修建，2007）。

範揚也討論了「陽剛之氣」在中國「隳沉」的原因。他認為，魏晉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世風日下，由『陽剛』轉向『靜穆』，縱酒不與世事，每日高談闊論，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男子有人及時行樂，塗脂抹粉；有人隱身避世，放蕩不羈」。而到了明清，「時風染上纖細、繁縟、富麗、俗豔、矯揉做作，雖百般精細而不厭膩」（範揚，1988: 4-6）。

範揚指出，中國人所能奉行的最高準則並不僅僅是陽剛。法家主張入世，老莊哲學帶有厭世和消極色彩，《易經》強調「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構成了中國男子社會心理定勢，也形成民族男性氣質的主體（範揚，1988: 139）。中國文化下頌揚的兩性和諧模式，也不只是英

雄美人，而是才子佳人。貌似美女的男子如宋玉、潘安，也是被文化所欣賞的。

林驊、方剛則直接稱《紅樓夢》男主人公賈寶玉具有女性氣質，是一位「男性解放主義者」（林驊、方剛，2002）。聶春豔指出，清代小說中男性主體的退化，來自於清代政治、文化的專制造成的人文心態和性格的扭曲。軍事征服與思想鎮壓使得「男性陽剛之氣」退化，「而多了一種察言觀色委曲求全的品格、惟命是從柔順軟弱的個性」（聶春豔，2004）。

也有學者對中國男性氣質的「柔性」使用另外的稱謂。Futoshi Taga的一項研究提出，東亞性別關係與西方有很大不同，男性氣質圍繞文武建立。前者是精神的或文化的，後者是生理的及肉體的。在中國文化中，文強於武，學者和官員高於士兵。而在西方文化中，這是相反的（Taga, 2005）。臺灣青年學者高穎超也在研究中提出了中國男性氣質具有文武分類的論述（高穎超，2006）。

筆者認為，將中國男性氣質以文武分類，難以明確彰顯其特點，還是「剛／柔」更能準確地與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思想及男性氣質的建構相契合。因此，筆者在此提出男性氣質的剛性趨勢與柔性趨勢這一描述，與筆者在分析康奈爾的理論時提出的男性氣質的支配趨勢及從屬趨勢形成呼應。如果說支配與從屬體現的是一種關係，是男性氣質具有等級性的兩種趨勢，那麼剛性與柔性則是個人在男性氣質實踐中體現出來的行事風格、外表氣質、個性特點等。剛性趨勢具有粗獷、強硬、倔強、粗糙的特點，而柔性趨勢具有溫柔、和諧、細膩的特點，筆者又將兼具二者的屬性、難分伯仲的男性氣質實踐稱之為剛柔相濟趨勢。

剛性、柔性是中國男性氣質的兩個理想類型，大多數的男性氣質實踐同樣是在這兩個理想類型之間的一個變動的點。這樣，我們便獲得了西方與東方各自的兩個理想類型，從而得以進一步

發展出一個「男性氣質實踐的十字軸」。我們將在第二章具體展示和討論這個十字軸，而本章主要用於完成文獻的梳理。在對男性氣質研究文獻梳理之後，我們需要再梳理一下關於本研究的對象——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文獻。

1.2.6 男性性工作者及其研究

此研究考察的男性性工作者，為以女性為顧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它作為一個行業，在西方的歷史也非常短。市場由需求決定，有學者對購買男性性服務的女性顧客缺少的的原因做了如下歸納：

1. 女人被社會化為喜歡年長的、成功的、比她們更有經濟實力的男人。女性自己在兩性關係中處於主宰的、控制的地位，與女人們所受的性腳本的塑造相違背。

2. 既使在當代社會，女人也不是性關係中的主動者，她們更接受「女人被追求，男人去追求」的模式。

3. 女人和男人對性機會的反應不同，對男人來講，多性機會對於保持他們的自我評價是非常重要的，而對女人卻沒有這樣的重要。所以在親密關係中，男人外出獵豔，要一夜情，他們更沉湎於性關係，而女人則更看重感情關係。

4. 為女性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缺少，也反映出歷史上，女人一直缺少權力、金錢，以及其他社會支持系統（Adie, Robinson, 1994: 43）。

在筆者看來，前三點講的都是女性氣質對女人行為的建構，這種女性氣質屬於性角色理論定義的女性氣質。後一點講的是女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的弱勢處境，這種弱勢處境又影響著她們女性氣質的實踐。

但到了20世紀，男性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行業開始出現。在美國，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迅速發展，婦女受教育

程度與經濟地位提升，使得購買男性性服務的女人多了起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婦女運動更促成女性地位的提升及男性性工作者的增加（Taylor, 1994: 10-13）。在歐洲，兩次女性解放運動，以及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男性社會性別角色的解放運動的影響，也被看作是男性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行業出現的重要原因（Adie, Robinson, 1994: 54-99）。而一些不發達國家男性性工作者的出現，則是被發達國家女性遊客的到來帶動的（Ratnapala, 1999）。在筆者看來，這些研究未闡明的背後寓意是：女性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中位置的變化，促成了女性氣質的變化，進而對男性氣質的實踐構成影響。與我們前面提及的男性氣質是在與女性氣質的互動中建構的觀點相呼應。

直到今天，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仍然非常罕見，而且沒有關於男性性工作者之男性氣質的專門論述，只是部分內容涉及了男性氣質問題。Lawrenson認為男性性工作者必須犧牲自己的男性氣質。他分析說，因為現代女性在購買男性性服務的關係中尋找優越感，而一個擁有強壯身體與個性的男人無法讓女人覺得自己有優越感，所以這些女人不喜歡強壯的男性性工作者。他進一步認為，職業的男性性工作者「沒有規則，沒有教條，他們只是想贏，想尋找到有效的技巧，令女伴滿意」，因此他們必須壓抑自己的男性氣質（Lawrenson, 1983）。

在筆者看來，Lawrenson仍然是在「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概念上使用男性氣質一詞，他一直在重複優越與低級的概念。因此，這一論述的背後，實際上潛在著對「男支配女」的傳統權力關係的簡單顛倒。所以，他的這些分析也非常片面，本研究後面所呈現的分析將證明他的論斷錯誤。

與之不同，Nelson則認為，男性為女性提供性服務並不必然挑戰傳統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女人就是一個背叛傳統女性氣質的群體，許多時候，受訪者格外強調對

傳統女性氣質的維護，甚至尊崇這種氣質。我們訪問的男性性工作者，仍然與傳統男性氣質的許多元素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所做的，只是通過精打細算的出價，通過不傳統的方法去獲得傳統的利益。他們並沒有改變傳統的男性氣質，而只是在傳統上變了一下花樣。受訪者絕大多數沒有顯示出對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鬥爭，他們的行為時常表現出兩面派。他們對傳統男性氣質和社會性別角色的挑戰，也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事實上的」（Adie, Robinson, 1994: 38-43）。在筆者看來，Nelson的論述從另一個角度捍衛著性角色理論下的支配性男性氣質，他實質上沒有承認多樣男性氣質的存在，而認為不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的行為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表演」。而筆者的研究將說明，所謂的「兩面派」是不同符號下男性氣質的實踐。

中國大陸學者關於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只有兩、三篇短文，但都扯到了「女權（女性）主義」。

有學者指出，面首是「中國古代男妓的特定形式」（史楠，1999: 9）。史楠對男寵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並從性別角度有所論述：「寵養男娼的女人，一般都是一些鄙視夫權世界、強橫荒淫之輩」（史楠，1999: 2）。「這既是對封建社會道德說教的一種諷刺，又是對帝王本身的一種懲罰，更是對夫權至上思想的一種以毒攻毒！」（史楠，1999: 8）一方面談反夫權，一方面又稱之為「強橫荒淫」、「以毒攻毒」，中國學者的這種矛盾心態，透露著其性別理念與性觀念的不完善。

對當代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只能夠檢索到一篇關於「深圳男妓」的短篇論文。作者表述了矛盾的評價，一方面說：男性性工作者的不幸處境「動搖了我所有對女權的堅持和對女性的信仰」，進而提出反思：「女權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另一方面轉而又說：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是「女性在認識自己的身體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經濟所得的自信，這體現了男女平權意識」（張慧

敏，2005）。

將男性性工作者與女性主義聯繫起來思考本無不可，但上面這些研究的缺點在於將二者的關係過於簡單化了，彷彿只要女人有錢有地位了，信仰女性主義了，就會去消費男性性工作者，或者男性性工作者的女客人都是女性主義者，至少受女性主義影響了。這顯然和常識有所違背。這些研究仍然簡單地從性別「權力」的角度進行分析，而缺少對男性氣質實踐過程及影響因素的深入解讀。本研究後面的分析將顯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質的實踐、女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要更為複雜和多樣。

本章，筆者梳理了西方男性氣質研究的理論，在對康奈爾的理論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質疑，同時對男性氣質研究中可以為本文所借鑒的一些最新進展進行了分析。在綜述中國本土的男性氣質研究中，提出了「柔性」這一特點，而這將為本文後面的研究所倚重。東西方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均非常缺少，專門針對這一人群的男性氣質研究更是幾乎空白。這些均使本研究具有了足夠的擴展空間。